

2011年秋天,网上的微博十分火热,各大网站都竞争。有送手机的,有索性给月份钱的,禁不起诱惑,也开始投入其中,注册一个账号,针对高铁改变时代,发了第一条微博:

自从有了火车,一个旧时代结束,一个新时代开始。时间开始了全新的意义,却仍然还有不同的理解。丰子恺先生从家乡去省城,乘火车只要四小时,可是宁可坐船。

微信的公众号

叶兆言

当时想发,指望借助微博平台,说些陈旧的小故事,温故而知新。譬如高铁开创了快节奏,过去的慢生活,是不是还值得回味。此外也有些别的念头,想看看微博会不会成为新的“世说新语”,能不能像曾经流行的唐诗宋词,激发人们写字数不多的短小文章。结果当然不是这样,微博的热闹超过想象,它的冷却来得一样够快。

有一种说法,微博已被微信替代。微博是博客升级版,微信是微博升级版,不知道这说法对不对,反正没玩过博客,也不在微信朋友圈出现。对于我来说,停止更新微博的原因很简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来的想法太天真,对微博期望值过高,真正置身进去,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首先信息太多,一开始觉得好玩,很快不胜其烦。我没必要知道那么多。

其次骚扰太多,总是有人跳出来捣蛋骂人。我不习惯那些莫名其妙的挑衅,没完没了地过来说几句话,甚至追杀到与朋友互动的微博里。我觉得没必要拉黑谁,可是网上太多拎着板砖和斧头的闲汉,不问青红皂白,每日里不骂几声娘就难过。

我的性格天生似乎当看客,对微博是这样,对微信更是这样。有人告诉我女儿,说已关注你父亲的微信公众号,说完很暧昧地笑了。女儿觉得奇怪,她知道老爹根本没公众号。上网一搜,哭笑不得,确实有人利用我头像注册,堂而皇之不断发布消息。内容无奇不有,标题又长又雷人,一看就知道不可能与我有关:“古人怎么过夜生活,妈蛋看到最后才是亮点”,“不要让未来的你,讨厌现在的自己”,“拴不住漂亮,就做精致女人”。

难怪人家暧昧一笑,我自己看了,都忍不住。青天白日的,这叫什么事,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人。遇到这状况,究竟应该怎么样,我不知道,有人说可以去投诉,用了你的头像,别人肯定误以为是你的公众号。

作为一个落伍者,到目前为止,仍然不明白什么是“公众号”,以上文字只不过想说明,我没有那玩意。

异性之间能有纯粹的友谊吗?

周国平

男女之间是否可能有真正的友谊?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常常引起争论的一个难题。即使在最封闭的社会里,一个人恋爱了,或者结了婚,仍然不免与别的异性接触和可能发生好感。这里不说泛爱者和爱情转移者,一般而论,一种排除情欲的澄明的友谊是否可能呢?

在《人生五大问题》中,莫洛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饶有趣味的。他列举了三种异性之间友谊的情形:一方暗恋而另一方容忍;一方或双方是过了恋爱年龄的老人;旧日的恋人转变为友人。分析下来,其中每一种都不可能完全排除性吸引的因素。道德家们往往攻击这种“杂有爱的成分的友谊”,莫洛亚的回答是:即使有性的因素起作用,又有什么要紧呢!“既然身为男子与女子,若在生活中忘记了肉体的作用,始终是件疯狂的行为。”

异性之间的友谊即使不能排除性的吸引,它仍然可以是一种真正的友谊。拜伦在谈到异性友谊时赞美说:“毫无疑问,性的神秘力量在其中也如同在血缘关系中占据着一种天真无邪的优越地位,把这谐音调弄到一种更微妙的境界。如果能摆脱一切友谊所防止的那种热情,又充分明白自己的真实情感,世间就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做女人的朋友了,如果你过去不曾做过情人,

将来也不愿做了。”在天才的生涯中起重要作用的女性未必是妻子或情人,有不少倒是天才的精神挚友,只要想一想贝多芬与歌德、贝多芬、梅森葆夫人与瓦格纳、尼采、赫尔岑、罗曼·罗兰、莎乐美与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就足够了。当然,性的神秘力量在其中起着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区别只在于,这种力量因客观情境或主观努力而被限制在一个有益无害的地位,既可为异性友谊罩上一种为同性友谊所未有的温馨情趣,又不致像爱情那样激起一种疯狂的占有欲。

在男女之间,凡亲密的友谊都难免包含性吸引的因素,但未必是性关系,更多是一种内心感受。交异性朋友与交同性朋友,倘若两者的内心感受是一样的,这个人一定出了毛病。作为一个通晓人性的智者,蒙田曾经设想,男女之间最美满的结合方式不是婚姻,而是一种肉体得以分享的精神友谊。倘若有人问:这种肉体得以分享的精神友谊究竟是什么东西——是爱情,准爱情,抑或仍是友谊?我来替蒙田回答吧:智者不在乎定义。

两性之间的情感或超过友谊,或低于友谊,所以异性友谊是困难的。在这里正好用得上“过犹不及”这句成语——“过”是自然倾向,“不及”是必然结果。

我所任教的公立学校,位于美国首都大华府地区马里兰州的蒙郡,是全美第26大学区,学生约15万。区内29所高中,十几所在全国名列前茅。2015-2016学年,州府拨款给蒙郡学区的教育经费是二亿三千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一学期四个学期,一学期大小考试七八个,每次批卷定成绩,我总是愤愤不平,这不平来自于教育部的一项“百分之五十政策”,政策规定每次考试,老师不能给学生低于总分百分之五十的成绩,就是说,即使全答错,只要她/他尽力了,老师就得给一半分数。两种情况可以给零分:作弊或交白卷。

作为一个在唯分数为上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中国人,我觉得这个“百分之五十政策”是天下最荒唐的事情之一。政策的目的是照顾学生的学习情绪,尤其那些有心向学、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学好的学生,使他们不必承受考试得低分的压力,避免因成绩不好而厌学,这和把学生放在第一位的教学理念一脉相承。但这政策很容易被学生滥用,尤其是不思进取的学生,使他们有恃无恐,老师最后被迫只能送分给学生。我一度尝试抵抗,但铩羽而归。

我的七年级数学班上有一个南美裔男生,堪称顽劣。在课堂上随意游荡,任意讲话,言语顶撞,善于狡辩,是校长办公室常客,属于全校知名人物,走到哪里都是一副“我是学生我怕谁”的神气。这类学生通常有种种家庭问题,无心向学,但对教育规定的学生权益,诸如如指掌。每次考试,他的成绩总是十分得三分、两分、甚至一分,我每次往计算机系统输入成绩时,看着那一两分,都得无可奈何地改成五分。终于在一次考试中,我决定输入他的实际得分:零分。

他当然很不满意地找我来了,说他没有交白卷,为什么给零分。我于是摊开那份一共九道题目、总分十五分的卷子,好像摊开一份谈判书。卷子没有留白,每道题下面都写了三两个字、或数字、或图案,都是毫无意义的涂鸦。我说,你不能随便写写画画,就没有交白卷,向我来要分;四十五分钟考试时间,你五分钟做完了,而且坚持说检查了不止一次,我能在哪里看到你的努力呢?

“你看,”他指着其中一道题说,“这是我画的一条实数直线,上面有数字,表示我在解题。”我说:“首先这不是一条直线,是随意乱画的扭曲线条;再看这些凌乱歪斜的数字,零右边是正数,零左边也是正数吗?”“是的,实数直线……”他还是非常自信的口气。“零左边是负数,这是小学数学,你不懂这个,倒也罢了;你连一条直线也不肯好好画,怎么说你努力了?”他说:“我学过的,都用上了,你为什么否定我的努力?”我不为所动,他又说,“你不给我分数,是因为你不喜欢我。”我面无表情,冷冷地看着他说:“我下面有课,请你离开。”他愤而离去,我愤而无语,稍坐,怒气愈盛,竟至于很不专业地把无辜的下一班老师教训一通,直到一个学生举手,一脸关切地问我“你今天心情好不好?”

刚下课,那学生的辅导员来了,说他投诉我不公,没有按政策判分,因此来了解情况。其实辅导员心如水清,但他竭力劝我还是给他一半分数,因为,“你说他乱涂,说他尽力,那是没有答案的争执”;如果家长也插进来闹——家长通常认定自己的孩子是天使——硬拿政策来说事,威胁要上告教育局,那就是一场车轮大战;教育局为了安抚家长,通常责令学校顺服家长意愿。为各方相安无事,最简单就是按政策办事,给他一半分数,把可能的麻烦扼杀在萌芽阶段。我虽在愤怒中,还是理智地知道在美国学校,有一句话千真万确:老师怕校长,校长怕家长,而学生呢?谁也不怕!这就是美国公立学校中老师的无奈和尴尬。



现实生活



比利时布鲁日 (油画) 金国明

西村原有一个小会计,当兵去了,他们就通过大队找我,要我帮着接活,把西村会计一道兼下来。我说:“东村会计都做不赢,再到西村管一套账,怎么弄得过来。”西村队长老季就说:“我们村小,好弄的。”我说:“村子再小,账目也是全套的,一样麻烦。”大队干部就在一旁做工作,说:“乡下读书人少,你就帮一把吧阿彭,这事跟你们老队长也商量了,他也支持的。”

老队长也支持,我还有什么话说。于是我同时当了两个生产队的会计,这事四乡八村没有过。西村会计家在河西,隔壁是一间茅草屋。我走过石桥去理账时,常见茅草屋门口坐着个婆婆,不是结线衫,就是纳鞋底,摸摸索索的,阳光下一头银丝。走进一看,才知道是个盲婆婆。队里放工或坐烟时,会有个汉子在茅屋进进出出,很黑瘦,还戴个眼镜,这在乡下不多见。他那副眼镜还是黑框的,把一张脸衬得更黑;不过再黑,读书人模样还在。他开口声声叫盲婆婆“妈妈”,可见是母子。

有次大队部开会,我问老季:“西村那眼镜是谁?”老季说:“下放干部杜汉卿。”我说:“你们有私心,放着下放干部不用,叫我当你们会计!”老季压低嗓音说:“你不晓得,杜汉卿有情况。”我问:“什么情况?”老季看看四周,说:“以后再跟你说。”

我常利用雨天去西村理账。雨天不出工,是“乡下礼拜天”。在这样的天气里,常能看到杜汉卿在门前河里“搞副业”。他有时在浅水的草丛里摸鱼,弯腰弓背的;有时在深水处用脚尖探蟹洞,昂着头憋气。不论深水浅水,他那副眼镜片子总在河面上闪啊闪的,有些滑稽。每逢这时,我就在石桥上大声叫:“杜汉卿!”他也大声回:“阿彭来了!”声音沿着河面,传出老远。这眼镜,想不到摸鱼还行;我算账时,常见他背里放工或坐烟时,会有个汉子在茅屋进进出出,很黑瘦,还戴个眼镜,这在乡下不多见。他那副眼镜还是黑框的,把一张脸衬得更黑;不过再黑,读书人模样还在。他开口声声叫盲婆婆“妈妈”,可见是母子。

那天摸鱼回来,杜汉卿挑了两条筷子长的鲫鱼,送进会计室,说:“这两条鱼你带回去,夜饭好好有个荤腥。”我说:“你不知道吗,我三餐都在小学里

搭伙,从来不开伙仓的。还是给老妈妈吃吧。”他也不坚持,笑笑。我拖个凳子请他坐,想跟他聊聊,把他那个“情况”聊出来。

可杜汉卿没坐,说有个老娘,又是瞎眼,不能脱人,还是你来我家坐坐吧。我说好,理完账就去了隔壁。他家很小,竹帘一隔,就算是两间,里间睡人,外间吃饭;那竹帘上,贴满毛主席像和样板戏海报,红彤彤的,比别家更红。

我问杜汉卿:“听口音你不是这里人吧?”杜汉卿“嗯”了一声。我问:“那你

以前在哪里?”他说:“在中学教书。”我说:“是学校派你下来的?”他说:“不,我犯了错误。”我怔了一下,还想去;又一想,再问下去好吗?如果是政治错误,无论历史还是现行,都还说得出口;如果是经济错误,无非钱物,也能说;可万一是生活方面的错误,涉及男女之事,他说得出口吗?我舌头一紧,遂向别处问:“你还领工资吗?”杜汉卿说:“没有了,跟大家一样挣工分。”我说:“怎么会呢?下放干部工资照领啊。”他苦笑一下,没回答。

当晚遇到老季,我就问起杜汉卿的身份,老季说:“他其实不是下放干部。”我说:“那你们怎么叫他下放干部呢?”老季说:“一个教书先生,工作没了,收入没了,拖着个瞎眼老娘到乡下来,还有比他更倒霉的吗?班子讨论,要是他不给他个名头,有些人就会把他当成‘黑五类’,日斗夜斗,斗死也有份。”我哦了声,说:“这些天接触下来,我觉得杜汉卿蛮老实。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啊?”老季狡黠地一笑,说,以后你就会知道。

1972年夏,作为空司雷达兵部赴藏调查团的一员,我驱车由拉萨往南,跨越奔腾的雅鲁藏布江,向甘巴拉山进发,那里驻守着世界上最高的人控雷达站。甘巴拉,藏语意为:不可逾越的山峰。它是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联袂携手的宠儿,海拔高度5374米,明镜似的羊卓雍湖,倒映着它挺拔的雄姿。汽车依山盘旋,当将标高4500米的碑石甩在身后,就再也见不到迎风摇曳的臧红柳、在山崖上奔跑的野牦牛和矫健的苍鹰了。我们已进入动植物均已绝迹的“生命禁区”了。

转过山口,跳出一段接近360度的险峻弯道,我不禁捏了一把汗。驾驶员小柯沉着稳健地驶过后,将车刹住,侧望幽深的峡谷,缓缓按响三声喇叭。我愣住了,只见他年轻黝黑的脸庞上,淌下两行热泪……他向我讲述了曾在这里发生的悲壮一幕。那年隆冬,连续一波猛似一波的暴风雪,将崎岖的山路冻成

了蜿蜒的冰道,燃料、食物和水都运不上山。每天一杯水,就是战士漱洗饮用的全部配给。一分钟都停不得的柴油发电机,油箱张着饥饿的大口,水箱干得丝丝冒烟。团部汽车班老班长,这位在高原雪域开了五年车的老兵,焦急地连夜带上小柯,在车轮上绑上防滑链,向甘巴拉雷达站

运送急需品。老班长屏气凝神,如一位娴熟的舞者,将车从容地开上溜滑的山道。左右灵巧地打着方向,适时地轰油门、踩刹车,抵达山顶后,战士们闪着泪花,与他们拥抱在一起。可在下山时,他们遭遇了突袭的风暴,弹珠大的冰雹“噼里啪啦”砸向车窗玻璃,视野一片迷茫。就是在刚才那个弯道,险情发生了。老班长倾尽全力,仍阻止不了汽车无情地向悬崖边滑去……他叫小柯赶紧跳车,可小柯面对教他

开车教他做人的老班长,呼喊声:“不!我们生死都要在一起!老班长猛地用力将他推下车去。而自己却和车一道坠下了深谷……喇叭声是为悼念老班长的英灵。

我登上山顶,湛蓝纯净的天空,似乎伸手可及。举目远眺,群山巍峨,银装素裹,绵延至天际。参天的冰峰石柱,似水晶般透明闪亮。一缕夕阳,从中穿透辐射开来,给这银色世界镀上一层耀眼的金黄。我正陶醉在这如诗如画的梦境中,暮然,一大团铅灰色的云层汹涌而来,暴风骤起,裹卷着大片的雪花狂舞。我猝不及防,赶紧扶着身旁那座标高石碑。眼前,猛的一亮,脚旁岩缝冰凌中,傲然挺立着一株雪莲花。它粗壮的茎秆上,伸出几片绿叶,簇拥着一团洁白如雪的棉朵。在这雪山之巅,它经受了无数次暴风雪的洗礼,正骄傲地挺直腰杆,高昂着头……

冰山上的雪莲

钱龙

我是学生我怕谁!

翁叙园

我所任教的公立学校,位于美国首都大华府地区马里兰州的蒙郡,是全美第26大学区,学生约15万。区内29所高中,十几所在全国名列前茅。2015-2016学年,州府拨款给蒙郡学区的教育经费是二亿三千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一学期四个学期,一学期大小考试七八个,每次批卷定成绩,我总是愤愤不平,这不平来自于教育部的一项“百分之五十政策”,政策规定每次考试,老师不能给学生低于总分百分之五十的成绩,就是说,即使全答错,只要她/他尽力了,老师就得给一半分数。两种情况可以给零分:作弊或交白卷。

作为一个在唯分数为上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中国人,我觉得这个“百分之五十政策”是天下最荒唐的事情之一。政策的目的是照顾学生的学习情绪,尤其那些有心向学、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学好的学生,使他们不必承受考试得低分的压力,避免因成绩不好而厌学,这和把学生放在第一位的教学理念一脉相承。但这政策很容易被学生滥用,尤其是不思进取的学生,使他们有恃无恐,老师最后被迫只能送分给学生。我一度尝试抵抗,但铩羽而归。

我的七年级数学班上有一个南美裔男生,堪称顽劣。在课堂上随意游荡,任意讲话,言语顶撞,善于狡辩,是校长办公室常客,属于全校知名人物,走到哪里都是一副“我是学生我怕谁”的神气。这类学生通常有种种家庭问题,无心向学,但对教育规定的学生权益,诸如如指掌。每次考试,他的成绩总是十分得三分、两分、甚至一分,我每次往计算机系统输入成绩时,看着那一两分,都得无可奈何地改成五分。终于在一次考试中,我决定输入他的实际得分:零分。

他当然很不满意地找我来了,说他没有交白卷,为什么给零分。我于是摊开那份一共九道题目、总分十五分的卷子,好像摊开一份谈判书。卷子没有留白,每道题下面都写了三两个字、或数字、或图案,都是毫无意义的涂鸦。我说,你不能随便写写画画,就没有交白卷,向我来要分;四十五分钟考试时间,你五分钟做完了,而且坚持说检查了不止一次,我能在哪里看到你的努力呢?

“你看,”他指着其中一道题说,“这是我画的一条实数直线,上面有数字,表示我在解题。”我说:“首先这不是一条直线,是随意乱画的扭曲线条;再看这些凌乱歪斜的数字,零右边是正数,零左边也是正数吗?”“是的,实数直线……”他还是非常自信的口气。“零左边是负数,这是小学数学,你不懂这个,倒也罢了;你连一条直线也不肯好好画,怎么说你努力了?”他说:“我学过的,都用上了,你为什么否定我的努力?”我不为所动,他又说,“你不给我分数,是因为你不喜欢我。”我面无表情,冷冷地看着他说:“我下面有课,请你离开。”他愤而离去,我愤而无语,稍坐,怒气愈盛,竟至于很不专业地把无辜的下一班老师教训一通,直到一个学生举手,一脸关切地问我“你今天心情好不好?”

刚下课,那学生的辅导员来了,说他投诉我不公,没有按政策判分,因此来了解情况。其实辅导员心如水清,但他竭力劝我还是给他一半分数,因为,“你说他乱涂,说他尽力,那是没有答案的争执”;如果家长也插进来闹——家长通常认定自己的孩子是天使——硬拿政策来说事,威胁要上告教育局,那就是一场车轮大战;教育局为了安抚家长,通常责令学校顺服家长意愿。为各方相安无事,最简单就是按政策办事,给他一半分数,把可能的麻烦扼杀在萌芽阶段。我虽在愤怒中,还是理智地知道在美国学校,有一句话千真万确:老师怕校长,校长怕家长,而学生呢?谁也不怕!这就是美国公立学校中老师的无奈和尴尬。

山顶严重缺氧,指战员们每顿吃着半生半熟的面条米饭,常年难见新鲜蔬菜和水果,声音嘶哑,嘴唇燥裂。指导员和我说着话,干裂的嘴唇竟渗出几滴血珠。他提醒我:内地来的,很快都得趴下吸氧。果然,我的后脑勺开始炸裂般的疼痛,一阵紧似一阵。胸口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喘不上气来。他让我钻进鸭绒睡袋,一根长拉链,从脚底到颈部拉了个严实,氧气包的皮管塞进了我的鼻孔……醒来时,已是深夜,月光下,窗玻璃上绽放着璀璨的冰花。哨兵皮鞋踩踏冰雪,抵御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依依惜别甘巴拉时,我捧起那株雪莲花,我要把它带回内地,让人们见识它的纯洁壮美。告诉人们:在这冰山雪峰上,日夜驻守着像雪莲花一样纯洁壮丽的高原卫士……

家有三兰,书就香了,人就幽明了,明请看本栏。



夜光杯